

绳其祖武 与时俱进——第十五届民盟文化论坛主旨报告选编

7月18日，第十五届民盟文化论坛在沪举行。在开幕式上，上海市文史馆原馆长、《世纪》杂志主编沈飞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民盟盟员何祖华，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民盟盟员蒋铁骊，先后作精彩的主旨报告。本期特别整理其主要内容，供大家学习交流。

萧乾先生（1910—1999年），著名记者、作家和文学翻译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文坛前辈、民盟先贤。他是二战时中国在欧洲唯一的战地记者，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第五任馆长。他在1951年加入民盟，曾任民盟中央第五、六届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他还是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委。

1989年4月，萧乾先生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其时他已80岁高龄，但他没有想着安度晚年，而是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竭尽全力来推动新时期文史馆的传承工作，开创

全国文史馆工作的新局面。他曾形象地来表达他的“脚踏车理论”：“办文史馆就像人骑脚踏车一样不能停，一停就倒了。只要不倒下就努力地向前踏去。文史馆必须开展活动，不开展活动就停止了生命。”他主张文史馆要充分发挥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立志要“跑好人生的最后一圈”。

萧乾先生于1992年初创造性地提出在上海市文史馆主办的《上海文史》季刊的基础上，改由中央馆与上海馆联合创办文史纪实类的大型双月刊《世纪》杂志，体现了他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

《世纪》杂志1993年7月在上海创刊，如今已成为一份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文史纪实类优秀刊物，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内容，为保存民族历史记忆、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在1988年赴京参加全国参事室文史馆工作会议期间，第一次见到

仰慕已久的萧乾先生，并有幸参与筹办《世纪》杂志，担任副主编。伴随刊物一路走来，前后正好30年（我是去年7月《世纪》杂志创刊30周年之际退休的）。萧乾先生给予我的谆谆教诲、殷切指导和热情鼓励，我铭记于心，并受益终身。在我看来，萧乾先生创办《世纪》杂志，是他的“脚踏车理论”推动新时期文史馆文化传承工作的新设想、新实践和新探索，为“积累史料、传承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意义重大而深远。

《世纪》编委会阵容强大，引人注目，各位编委都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成员主要是京沪两地的文史大家，北京的编委有刘北江、吴小如、王世襄、李锐、吴晓铃、常书鸿、谢云；上海有大家熟悉的冯英子（民盟盟员）、柯灵、施蛰存、钱君匋（民盟盟员）；京沪之外仅湖南有一人，著名的出版家、学者钟叔河。

萧乾先生有丰富的办报经验，

他身为《世纪》编委会主任，充分认识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必须在政治上为《世纪》把好舵。他从创刊号开始，就带领中央馆的编委开展审稿工作，紧紧围绕着办刊宗旨、方针和目标三方面，坚持明确的审稿标准，对每一篇文章进行全方位“体检”。

在创刊后第二期上有篇文章——《李国豪奋力保宝钢》，该文以翔实的第一手材料记述了以民盟盟员、同济大学名誉校长李国豪教授为首的宝钢顾问委员会，对国务院作出宝钢一期工程上马还是续建的决策，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有编委认为文章涉及宝钢前途决策的重大历史事件，要注意核实并掌握用语分寸，以免引起有关方面的异议。对此，萧乾先生同意在涉及中央时，用语宜慎重。不过他又说：“但我认为此文第一反映的是：中央十分尊重专家意见，并不固执己见。发表此文，可鼓励科学家们以报国为本职，相信中央，敢于畅所欲言。以这样‘温故而知新’的文章，《世纪》应

多登一些。即立足于未来的回顾。”萧乾先生提出“立足未来的回顾”，这句话寓意深刻，旨在期待《世纪》为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发挥积极作用，是对《世纪》宗旨任务的一种精辟诠释；既道出了《世纪》以回顾历史为内容存史的学术功能，又指出这些内容应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意义。其核心要义是刊物应具有文化传承的价值。

萧乾先生将他与夫人文洁若花费近五个寒暑翻译的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高稿，全部捐赠给《世纪》杂志。他还带病参加最后一次集体审稿。1997年2月16日早上，他吃早餐时，胃不舒服，吃了胃药，仍按约到中央馆参加集体审稿。20日，他因心肌梗塞住进北京医院进行治疗，从此再未离开医院。据文洁若女士说：“萧乾对《世纪》杂志很有感情……也可以说，他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中央馆馆员吴小如先生忆起萧乾先生，对我说：“文史馆的会我可以不去，但《世纪》审稿我不能不去。因为他比我大十二三岁，可每

次审稿必到，他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

“脚踏车理论”充分体现了萧乾先生作为老一代党外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也体现了他积极投身伟大的改革开放大潮，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脚踏车理论”和萧乾先生晚年为推动文化传承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作用。萧乾先生的“脚踏车理论”及其实践成果不单是全国文史馆或《世纪》杂志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属于民盟的，属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更是属于国家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大力传承和弘扬。



●沈飞德

传承科学精神 攻克科技瓶颈

●何祖华



在我看来，民盟精神与科学家精神高度契合。

什么是民盟精神？立盟为公、以天下为己任；正直正派、学有专长、甘于奉献；修德守身、淡泊名利、自尊自强。而科学家精神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被概括为：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身为盟员和科研工作者，这种精神始终引领我前行。

在我的科研生涯中，我国老一辈植物生理学家包括民盟前辈施教蔚院士等人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让我不断在自己的领域发奋努力。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的国际地位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方阵。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指数全球第一，农业专利竞争力指数全球第二，农业热点前沿国家总体表现力得分排名第一。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农业科技的原始创新能力还不足，核心技术少。同时，我国是世界上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可造成严重危害的生物灾害种类有100多种。并存在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及防治新技术和新手段缺乏、一线防控力量薄弱、绿色防治难以实施和推广等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重大病虫害和动物疫病的防控，保障农业安全。”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水稻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其产量和品质受到多种病原菌的威胁。其中，稻瘟病作为水稻的“癌症”会造成水稻的减产甚至绝产，是水稻生产中

最严重的病害之一。据统计，全球范围内每年因稻瘟病造成的损失高达水稻总产量的10%。我国不同稻区均是稻瘟病的易发区，每年因稻瘟病发病直接损失稻谷约30亿公斤以上。因此，防治稻瘟病是我国粮食安全生产的主要任务之一。

我来自农村，对水稻生产常受稻瘟病侵害而颗粒无收的状况深有感触，立志要潜心科研，解决这个难题。我的学术生涯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学农爱农、久久为功、攻坚克难。

1983年本科毕业起，我便开始跟随硕士导师、著名水稻遗传育种家中农坦教授开展水稻抗病性的遗传和育种研究。先生86岁还通过天窗爬到屋顶上种水稻，做杂交选育，让我深受感动，并立志向他学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主攻，与水稻“顽疾”死磕。我们常年奔波在田间地头，考察病害的发生情况，面朝黄土背朝天，虽然大汗淋漓、腰酸背痛，但在我看来，这大大提高了研究精度和科研的质量，这些坚持是值得的。

为了抢季节，我曾经一年三季奔波：4月在杭州播种，7月收获后马不停蹄地转到厦门天马镇或者南宁西塘镇做水稻翻秋，到冬季转到海南陵水。那时绿皮火车、客轮和长途汽车是主要交通工具，有时一坐硬座就是30多个小时，再转轮船30个小时到海口。为了不错过水稻季节，有时就在海南基地过年。

曾经有一年为了避开水稻检疫性病害—细菌性条斑病，我先把材料带到广西南宁西塘做研究，再带上收获的种子通过层层转车和轮船，花了整整5天时间到达三亚的羊栏镇进行种植，并且为了能及时观察水稻的抗病性和完成杂交选育，在羊栏镇的一个农药仓库住了3个月，为课题的顺利开展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数据与南繁种子。

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后，我带领助手与学生辗转全国不同稻区，分别在湖北、浙江、湖南、江西、福建、佳木斯

等地建立自然鉴定圃，结合上海和海南陵水农场。在水稻生长的重要节点，必须亲自去田间，手把手教学生做科研。这样，不仅能把成果留在田里，也能培养出优秀青年。

在我看来，做农业科研，不能盲目照搬国外模式，要敢于创新，发现农业科技中的重大科学问题。要能沉淀下来，系统研究新的科学问题，建立特色研究体系，为我国学科发展和农业科技创新作出贡献。我们多生态环境大规模筛选核心种源，在不同季节不同田间繁种做杂交选育，破解植物抗病新机制，创立作物抗病育种新理论，所开发的广谱抗瘟基因技术被广泛育种应用，近5年利用Pigm改良并通过审定的抗病水稻新品种至少15个。

针对作物在田间总是容易感染不同病害这一长期困扰生产的难题，我们发现作物与病原菌“军备竞赛”的新机制和多病原菌抗性的遗传网络，建立了创新的植物免疫前沿领域。从作物育种重大需求出发，研究抗病与高产的协调机制，服务种业发展。

通过抓住抗性产量拮抗的关键问题，系统挖掘关键调控基因，剖析抗病—产量、抗病—高温逆境等交互作用机制，我们发表了多篇Nature和Cell子刊系列文章，为高产抗病分子设计育种提供了一些思路。

同时，我们所挖掘的广谱抗病基因Pigm应用潜力巨大，已被隆平高科、荃银高科等40多家育种单位应用并审定多个新品种，抗病新品种已累计推广超过4500万亩，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现在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11年时间了。我们要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只争朝夕、埋头苦干、久久为功，一步一个脚印地把这一战略目变为现实。我坚信“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们还需坚持不懈地努力。

雕塑创作与文化记忆

●蒋铁骊



雕塑是一首记忆之诗。

雕塑自产生之初便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进程与记忆而展开。雕塑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自古以来便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雕塑表达特定文化价值，传承民族文化遗产，强化民族精神记忆，肩负国家形象表达。

雕塑艺术，作为人类文明的见证者，不仅是对历史的纪念，更是对当下的使命，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雕塑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那时的雕塑作品如《手持牛角杯的维纳斯》和《威伦道夫的维纳斯》等，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力量的崇拜。随着时间的推移，雕塑艺术逐渐成为表达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的重要方式。例如，红山文化的《龙》、哈夫拉金字塔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亚述帝国的《狮子》、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像》、秦始皇陵的《兵马俑》、西汉时期的《马踏匈奴》等，都是各自时代文化精神的体现。

雕塑是一首精神与纪念之诗。

雕塑承载着国家意志的构建。雕塑艺术纪念国家事件，代表国家认同，展现国家意志，介入国家形象的塑造。雕塑艺术，以其独特的纪念性，成为国家记忆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纪念，更是对国家认同和民族意志的展现。纪念性雕塑承载着对过去重大时刻的回顾和尊重。通过雕塑，历史得以具象化，成为可以触摸和感受的存在。例如，二战后美国的纪念碑雕塑《硫磺岛战役纪念碑》，立于美国华盛顿国家公墓陵园，不

仅是对战争中英勇牺牲士兵的纪念，也是对牺牲精神和国家勇气的赞颂。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根据“艺术属于人民”的方针，组织完成了《工人和集体农庄女庄员》的纪念碑雕塑，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强烈的时代感，成为了新生苏维埃的国家象征。苏联时期的雕塑《祖国母亲在召唤》，以纪念二战期间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85米的高度是伏尔加格勒的主要标志物，从城区、伏尔加河等不同地方都会远远看到该巨型雕像，强化了苏联人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朝鲜首都平壤金日成广场的《万寿台纪念碑》，由领袖像和人物主题群雕组成，传达了朝鲜的领袖权威和国家精神。这些不同国家的纪念碑雕塑，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是传递国家意志和文化价值的媒介。

新中国雕塑也体现了国家形象的塑造，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和重大事件。《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十块汉白玉浮雕，讲述了自虎门销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八个重要历史事件，一幅接一幅谱写了中国人民的抗争历史。强化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和对英雄的敬仰，使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文字，而是具体可见的形态。全国农业展览馆雕塑《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人民的风采，体现了勤劳、勇敢、智慧和团结的民族精神。毛主席纪念堂的主席雕像，纪念堂广场群雕，不仅是人民对伟大领袖的纪念，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向往，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国家未来的期待。新中国的国家形象雕塑，确立了人民至上，国家至上的精神表达。

雕塑是一首人民之诗。

雕塑反映着国家的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2021年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五大主题雕塑，即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审美工程。其中《旗帜》的汉白玉基座高1米，表现党旗的部分长21米、高7.1米，象征1921年7月1日，红色寓意血染的风采，高高飘扬党旗，体现了方向和力量。四组汉白玉人物群雕主题分别为：《伟业》《攻坚》《信仰》《追梦》。每组群雕均长15米、宽4.5米、高8米，雕像选取了各行各业与各民族人物形象，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昂扬意志，表现全国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的追梦激情。

雕塑是一首不同文明的交流之诗。

雕塑是中西交流的使者，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雕塑艺术都肩负着沟通的使命。国际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创作的雕塑作品，在世界多国永久。例如，2017年，《孔子》立于巴西库里蒂巴市的“中国广场”，《灵魂之门——塔拉斯·舍甫琴科与杜甫对话》立于乌克兰基辅国立大学植物园(诗园)。2018年，《伟大的行者——马克思》立于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尔市西蒙广场。2019年，《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永久收藏于意大利艺术研究院。2020年，《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落户意大利芬奇市，永立利奥纳多·达·芬奇博物馆和图书馆。2021年，《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立于希腊古市集，《隐元禅师像》立于日本兴福寺。2022年，《鉴真铜像》立于日本东京上野公园“不忍池”湖畔。2024年，由中国圣哲孔子和老子两尊雕像组成《问道》组雕，永立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市中心巴特列公园。这些矗立在异国的中国雕塑家的作品向世界传播了东方思想，讲述了中华文化，促进了中西交流。

纵观雕塑的历史，雕塑作品超越时间与空间，超越种族与地域，是表达国家形象与象征的载体，是承载人类记忆与精神追求的寄托，是凝聚人类审美智慧与哲理的诗篇。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五重意蕴

●王朝科

学习园地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呈现出来的新质生产力形态，是顺应新时代发展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论断诠释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关系。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从绿色发展理念、生产方式生态化、消费方式生态化、绿色技术以及资源环境生态系统承载力五个维度展开。

第一，绿色生产力是体现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

绿色发展是指将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内化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经济产出，创造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新型发展模式，其核心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

绿色发展的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四个层次：一是绿色经济。摒弃传统的财富观和追求财富增长的传统路径，树立绿色财富、绿色福利和幸福经济新理念，通过绿色投资，形成绿色生产力、增加绿色财富，扩大当代人和

未来世代的生存发展空间，夯实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既获得最大化的经济产出，又实现生态环境最优。

绿色经济的两大支柱是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消费方式。二是绿色政策体系。社会经济政策具有引领和校正社会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作用，要以绿色发展统驭社会经济政策，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协同性的绿色政策体系。三是绿色文化。绿色文化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意识和价值观的总和，绿色文化就是使全社会形成普遍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意识和价值观，以及在生态伦理意识和价值观规定下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自觉和行为规范。四是绿色发展目标。“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二，绿色生产力是体现生产方式生态化结果的生产力新质态。

所谓生产方式生态化，是指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组织社会生产过程，通过绿色投资，促进自然资本大量增值，夯实社会生产的自然基础，从投资自然获得社会生产的不竭源泉；运用绿色技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小的环境压力，获得更高水平和质

量的经济产出。

绿色生产方式包括三个要点：(1)生产目的不仅要获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实现持续、稳定、健康的经济增长，同时还要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最大程度的改善，至少不造成环境质量持续恶化。传统生产方式之所以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生产方式只有一个目的——产出最大化，而绿色生产方式有两个目的——产出最大化和环境最优。传统生产方式只对产出成果进行核算，而不因生产导致的环境问题进行核算，从而因生产方式既核算产出成果，也核算环境成本。(2)绿色生产方式应该同时具备三种功能，即物质财富的生产功能、精神财富的生产功能和自然财富的生产功能。(3)绿色生产方式的评价尺度是人与自然和谐，既要满足人自身的需要，同时要与自然生态规律高度一致。

第三，绿色生产力是体现消费方式生态化结果的生产力新质态。

消费方式是消费主体与消费对象的结合方式，消费方式生态化将人类的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有机联系起来，实现消费主体消费观念绿色化、消费对象绿色化、消费过

程绿色化以及消费结果的绿色化，同时在整个社会形成绿色化的消费文化、绿色化的消费环境、绿色化的消费政策和绿色化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绿色消费方式是崇尚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为典型特征的消费行为过程，包括四层含义：(1)生态环境直接就是人们的消费对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清新空气、洁净饮水、安全食品 and 优美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环境就是民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消费过程不仅实现人自身的发展，而且要通过消费创造自然财富，消费活动本身也要成为一种提供生态产品的活动。(3)绿色消费方式主张通过消费实现人对物质财富的满足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均衡，把消费活动形成的环境生态压力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内，消费不能成为破坏良好生态环境的另一种力量。(4)要形成将生态环境自觉纳入消费者的消费决策中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促进形成绿色消费文化。

第四，绿色生产力是体现绿色技术广泛应用结果的生产力新质态。

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是指生产

领域中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工艺流程、操作方法以及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的积累、更新和发展。从更广泛的消费政策和绿色化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传统的技术进步理论仅以产出水平或者仅以技术效率为目标函数，完全不考虑技术与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关系。引入生态环境质量，技术进步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可能关系可以概括为下列五种类型：直接生态环境破坏型技术；间接生态环境破坏型技术；代际转移生态环境破坏型技术；生态环境破坏减弱型技术；生态环境改进型技术进步。后面两种类型可称之为绿色技术。生态环境改进型技术进步又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清洁生产技术(环境友好型技术)，它可使生产过程无废或少废，从而实现过程的零排放、零污染以及最终产品的绿色化等；二是预防和末端治理的技术，如汽车尾气控制技术、烟煤脱硫技术、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水污染防治技术、填埋和焚烧固体废物技术、噪声污染防治技术等，旨

在通过末端治理实现无害化；三是资源再生利用技术，旨在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第五，绿色生产力是体现资源环境生态承载力的先进生产力。

自然环境是生产力的自然物质基础，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环境生产力或生态系统生产力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命题：自然环境是生产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已知和可用的纯粹自然力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之一或者说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之一，是潜在生产力的来源；纯粹自然力成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要素是有条件的，包括人类自身认识力所能达到的边界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纯粹自然力成为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使用自然资源不是无限度的，而是要充分考虑其承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指引，以生产方式生态化、消费方式生态化、技术绿色化等为重要支撑，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作者系民盟市委学习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资本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